

聚焦文学新力量

赵志明,“70后”,江苏人,现居北京。出版有小说集《我亲爱的精神病患者》《青蛙满足灵魂的想象》《万物停止生长时》。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南京市‘青春文学人才成长计划’”签约小说家。

打开感觉的通道

□林舟

感觉或者说意识、潜意识里那些未经言明的印迹,是赵志明小说叙事力量的策源地和指挥中心。在交织着寒冷与荒诞、黑暗与魔幻、挣扎与希望的故事底部,似乎总有一种温柔的潜流在涌动——那来自作者在打捞乡村社会记忆时的悲悯之心。

赵志明的小说里,那些色彩缤纷、奇思妙想的感觉,多来自作者度过少年生活的农村,以其独特的书写占据了读者更多的注意力。比如《我们都是长痔疮的人》简直是邪气四溢地写出苦难而难堪的生存;《我是怎么来的》以充满欢快的口吻讲述贫瘠的生活里农民的算计;《一家人的晚上》将父亲之死置于冷冽的氛围与白无常的鬼魅之气中暗示和描述;《一场大雨的记忆》描述了一场水灾被看成火灾的荒诞景象,无不带着浓厚泥土气息的黑色幽默和反讽意味,展现出农村生活的艰难与残酷,人性的麻木与沦丧。《青草香》《雪地白菜》等小说则在朴素又冷静的讲述中将人情世故、伦理冲突和寻求慰藉的情状娓娓道来。《还钱的故事》丝丝入扣、层层推进地描摹心理的变化,在细节刻画中表现人情冷暖。在这当中,感觉或者说意识、潜意识里那

些未经言明的印迹,是赵志明小说叙事力量的策源地和指挥中心,它启动故事,输送细节,调度场景,控制节奏。《村庄落了一地大雪》开始的场景,叙述者连用5个段落铺展雪天傍晚农村的景象,颇具古典小说的风范和笔力,鲜明准确而又不乏灵动。故事从“这时候响起了敲门声”开始,但叙述者并不急于展开叙事,而是将笔墨交给了场景和感觉的描述:“门是一幢三间头瓦房面东的墙壁上的门。瓦房坐落在村东头,旁边是一条路,路傍着一条河。敲门的声音听上去就像是几团被冻僵了的麻雀。”在故事的展开过程中,作者却将笔力放在对人物活动细节惟妙惟肖的描绘上,比如写两个女人睡觉的姿势:“女人甲一躺下身体就缩起来,像个半个括号;女人乙是另半个括号。不是相对的,而是相背的,沿着她们的背脊梁,寒意列队横穿被窝。”还有对鼾声的描绘:“像一片挟裹在呼啸北风里的树叶,拔高,下降,颤抖,突然又悄无声息。”这些生动的描写有如写意的线条中宕开的笔墨,却又紧贴着、照应着情节的延伸,将围绕着收音机的叙事的层次逐渐地勾勒出来,渲染出一片孤独无依、寒意逼人的情境。

赵志明的小说叙事如此着力于感觉世界的传达,拉慢了叙事的节奏,甚至刻意造成叙事的停顿,营造出一种沉浸的语言效果,让你暂时地忘记了故事,甚至有时候让你觉得,故事之类不过是偶尔的物件,不必那么费心地连接为有机的整体,而任其在感觉的河流中飘荡。

《另一种声音》完全潜入到人物的体验之中,顺着内心世界的逻辑,生动地表现父亲的死在小男孩心理上引起的变化。最初,小男孩在教室里听到父亲死了的消息后,“一种羞愧感使他抬不起头来。他像一头小动物,带着满脸的泪水,冲出了校门。”这种羞愧感极为准确地捕捉到了小男孩对自己从环境中突然剥离的敏感,面对死亡的懵懂以及对未名经验冲击时的不自在。男孩在回家的路上庆幸无人注意到他,可也无心玩他极为擅长的石子,便将石子抛了,“石子划了几道弧线,之后就无影无踪。他的心也空荡荡的,像注了水一样有一种空明的眩晕”。如此具有代入感的叙事,激发的是内心经验的共振与想

象,伴随着事件的进程,向内心世界挺进,看见了通常难以命名的感觉。人物内心的感受层次就这样渐次打开,呈现出来。在父亲的尸体前,“当小男孩萎缩地触摸到死者的手时,寒意蜇了他一下,他惊惶地退开了”。这时候,恐惧已经不可阻遏地抬起头来,当小男孩和哥哥被母亲命令去看鱼塘的小茅屋时,更为细腻而富有层次的恐惧感叙写出现了,“外面有一种打鼓的声音,是一种什么东西发出的吧,咕咚咕咚的,声音使人想起一个无底黑洞,使人浑身发冷。”就是在这样对感觉世界的开掘中,小说完成了对小男孩内心一段隐秘而充满自我蜕变之痛的过程的呈现,揭示出幽微、揪心、脆弱、敏感的生命存在。这些书写在交织着寒冷与荒诞、黑暗与魔幻、挣扎与希望的故事底部,似乎总有一种温柔的潜流在涌动,我以为那来自作者在打捞乡村社会记忆时的悲悯之心。赵志明的小说当然有对乡土小说的营养汲取,但我以为这些小说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未被言明、未被抽象而又意趣横生、鲜活生动的经验。其次,这些小说在作家与作为客体的故乡之间构成的关系状态上,明显偏重于审美感性的观照,保持着既非对抗也非亲近的反讽距离。如果说这些小说对抽象的东西有所指涉,那也应在一种隐喻状态下获得,意味着多义性和混杂性,顶多有所暗示,更多地依赖读者自身携带的语境去玩索。

赵志明的小说世界原本可能就在我们的记忆中沉静而闪烁,它被“此刻”的某个意象、某种感觉搅动起来,刺激起来,泛滥开去,小说的时空由此阔大开来。对赵志明来说,“此刻”是如此的重要,仿佛高台跳水的踏板,将一个优美的姿势瞬间送入虚渺的天空,旋即扎入一池碧水。

《小镇兄弟》里写凋敝的乡镇:“老街的颓败,就好像一条船,在时间的河流里,先是搁浅,然后慢慢沉没,直到没顶,一切化为乌有。有的店面虽然还存在,但就像一个老去的人越来越明显的秃顶一样突兀,恰是一种颓败的佐证。”这样的描写极具穿透力,在感觉的联想中击穿了我们的这个时代脆弱而又无所不在的皮肤。《缩微胶卷》里,摄影师的身份、经历与“回不去的故乡”的感喟非常吻合,叙述者借助他的视角展开的故乡图景,因为



赵志明

限知性的叙事反而增强了某种可靠性。“故乡满目疮痍,刚刚发生过一场战争,到处都是摇摇欲坠的建筑,建筑上布满窟窿。那是门窗都被卸掉的缘故,就好像遭受过猛烈的炮击。”《万物停止生长时》则将家庭悲喜剧、人物命运传奇置于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下,触及时代的各种病兆。“走在乡间小路上的宠物犬是一种荒诞的存在,它们的毛打卷,脚上和肚皮上全是泥土,有的扎着红头绳小辫,可怜巴巴地用耷着眼睛的狗眼远远地打量着陌生人。”寥寥数语将中国城乡变迁中的滑稽、荒谬神情毕肖地展示出来。小说更着意于展现各种变故之中某些不变的东西,像血缘亲情、家族观念、善恶是非的标准,勤劳隐忍的品行等等,所有这些以一种混杂的状态在小说叙事的推进中缓缓闪现,更在脑髓者喜庆、魔笛这些人物的描绘中得到强化,包含着更为矛盾复杂的感受。

在另一种意义上,乡村生活的隐喻化叙事是赵志明在靠近自己经验世界时的演练。在《钓鱼》《无影人》《疯女的故事》等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演练设置了更高的难度系数,并且也因此而释放出更为强大的隐喻的力量。它们一如赵志明的其他小说,充满丰沛、精细的感觉书写,感觉凝结成意象,意象包裹着幻念,幻念与意象勾连,通往人的存在中晦暗不明而时时涌动的区域,指向自由的渴望,而这在我看来,正是赵志明小说写作的最初源头和强劲动力。

创作谈

北京到南京的高铁上,我常常一直盯着窗外看。从天津到徐州是北方的景致,不是高粱就是麦子,我看到田间经常跳出一抔小土堆,土堆前偶或有花圈纸钱之类,应该是坟墓无疑。在深阳,我的印象中并没有坟墓是圈在农田中的,每个村一般都有坟山,集中埋葬先人,也有的人家将坟墓选址在自留地上。究其原因,可能是北方种高粱小麦而南方种水稻,水稻离不开水,水稻田里当然不能存有坟墓了。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而我苦思很久才想明白。

在冯梦龙的《警世通言》中,有一篇《王安石三难苏学士》,苏东坡才高八斗,也难免自以为是犯下错误。以世界的广而大,时间的久而远,越是言之凿凿的定论,恐怕越容易受到新知识的挑战,站不住脚。历史如此,现实也如此,个人经验恐怕更是如此,无论喜恶情感。我在我之前还有一个夭折的兄长。我母亲生我时,我的大姐已经是大姑娘,结果她在我出生日期这点上记差了,相隔了一天。莫衷一是,我就索性连着两天都过生日。日期都会混淆,更不用说详细的时辰了。因此,我不太喜欢星座学,它讲究精确,而我恰恰是个万事糊涂的人。

基于此,每当我母亲和哥哥姐姐们聊起往事,我在一旁聆听,常会猛然惊觉:她们这次说的和上次说的有不一致的地方,甚至截然相反。推广开来,邻里之间、亲朋好友之间,所谈论者也都不可疑。无关于对错,在表情之反应、事件之叙述和情感之表达上都有明显的变化。对此,我很愕然,常常无所适从。

反映到写作上,大致也是如此。要写什么,怎么写,并不自信,识途老马是没有的,每一次都像小马过河那样战战兢兢,好在我有勇气,不怕失败,心想:大不了就像他们在日常中的闲聊,闲聊哪有一定的准则和规矩,不过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年龄、身份和经历,或物所欲言,或惜字如金而已。所以我的小说显得很笨拙,立意不高妙,逻辑很混乱,人物也立不起来,大概是作者糊涂,笔下的人物也就浑沌,因为没法像须、史两位为之开窍。鉴于此,我不敢、也写不来那类聪明、漂亮、得体的小说。

曹雪芹大约会反对一个糊涂的人从事写作这件事,因他说过:“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所谓洞明、练达,都是聪明人的标签,但《红楼梦》里的聪明人大概没有好下场,万般宠爱集一身的贾宝玉,也因爱以及失玉之后神志愈发不清不白了。曹雪芹自己大概也是不善变通的人,似乎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因而才发奋著书的。可见,世上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无论是清醒者还是浑沌者,一生所经历的事大抵都逃不过这个比例。

所以,蒲松龄写《聊斋志异》,鲁迅写《彷徨》《呐喊》,他们既聪明又糊涂,还不是假糊涂,是真的糊涂,他们寄身于此幽微晦暗的世界,偏又火眼金睛洞若观火,活该饱受撕裂般的痛苦。我做不到他们的高屋建瓴,我的格局眼界小太多,但依然勇敢,不惮以他们为榜样。

在幽微晦暗中洞若观火

□赵志明

新作快评 鲁引弓中篇小说《那些年的情敌》《上海文学》2016年第2期

鲁引弓的中篇小说《那些年的情敌》以上世纪80年代末重要历史事件为纵轴,以大学校园爱情故事为横轴,精心绘制了一张关于时代与个人、理想与现实、存在与虚无的精神坐标系。作者鲁引弓一方面采用移步换景、散点透视的方式去钩沉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又通过近镜头特写,单点聚焦的策略来捕捉青春往事,从而使读者既能够感受到大时代的强烈震撼,又可以触摸到个体生命的细微脉动。

单就叙事内容而言,小说并无太多新意,大体讲述的无非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和“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此外别无他话。从情节的编排上看,小说也并未跳出“校园爱情故事”的程式化写作套路:邂逅、追求、相恋、失恋、毕业、分手……几个关键词便足以道尽全部,此外仍别无他话。然而,如果我们据此便将其简单归入“青春文学”的写作范畴,就显得有些过于仓促和轻率了。因为作者的叙事重心并非在于谈“情”说“爱”,而是要借助“一叶知秋”的叙事手法去呈现80年代末期特有的文化气氛、思想情感和精神症候。一般意义上的“青春文学”,爱情故事发生的时代往往只是作为叙事背景存在,而在《那些年的情敌》中,“时代”本身就是“爱情”的一部分,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时代”才是整个“爱情”故事的主人公。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其实那那些“我”的最大情敌不是爱唱摇滚的老蒋,也不是骑着“雅马哈”的伟亮,而是80年代一阵阵变幻着的“名词”浪潮:诗歌、流浪、自由、海南、商海、时局……正如文中所言:“新一轮浪潮上场,它淹没个人,让许多琐碎纠结暂成‘杯水情感’,无暇顾及,它以大时代的架势呼应了不济世事的青春形态。”由此可见,“校园爱情故事”不过是作者鲁引弓呈现特定历史条件下个体小我与时代大我之间复杂微妙关系的媒介,小说文本内部所散发出的那种不可名状的时代气息与情绪是一般意义上的“青春文学”所无法企及更无力消受的。

除了“我”与时代的“情敌”关系之外,小说的精彩之处还在于,它为读者建构了一组双向观照的镜像结构——一方面是通过个体来观照时代,另一方面是透过时代来打量个人。前者借助“我”的追忆性视角来回望那个充斥着“小布尔乔亚情结”与荷尔蒙冲动的疯狂年代,这种“我注六经”观看方式,使得宏大的历史叙事被点染上了浓郁的个性化色彩;后者则通过“时代”之眼来观测个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这种“六经注我”的观看角度,又为个人情感平添了许多历史的厚重与沧桑。

评论

政治叙事的学理与立场

——读龙长吟《治守之道:湖南当代政坛文学典论》 □聂茂

龙长吟的《治守之道:湖南当代政坛文学典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是他对湖南当代官场小说学理阐释的集中奉献。作者尽可能聚焦这一群体的作家及其作品,并对不同文本进行了深入分析。比如,对于唐浩明,作者用“儒家文化观照下的廊庙之思”进行概括;对于王跃文,作者用“政治眼光与人性解剖”来阐述其作品的“思想艺术魅力”;对于阎真,作者用“知识分子的灵魂透视”来统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精神操守。

书中还用不同的篇幅和视角分析了肖仁福、刘春来、吴茂盛、余艳、浮石、魏剑美和黄晓阳等人的代表性文本,对彭见明的《天眼》也进行了适当的解读。谭仲池、胡丘陵、刘克邦和管群华等人的诗作,作者更是不惜笔墨,对其进行了颇具见地的阐释。龙长吟在选取阐释对象时十分讲究:首先是影响力与美誉度。作者选取的作家及其文本大都具有广泛的读者基础,如《曾国藩》《青瓷》《二号首长》等。其次是文学性与思想性。龙长吟在选取分析对象时,不仅仅关注作品的关注度,更关注热度背后的文化因子,努力做到文学性和思想性的高度统一,《国画》《沧浪之水》等就是如此。再次是代表性及广泛性。龙长吟既着力阐释有影响力的官场小说作家及其作品,又对尚不是很出名、市场辨识度不很高但又颇有特点的湖南官场小说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富有前瞻性的分析和讨论。如分析王跃文时,作者着

眼于作家对官场文化的深度发掘,认为王跃文将官员与官员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那些确实存在又谁都不可明说的潜规则写得入木三分。而对余艳的分析,从“官场后院”即太太们这个特殊群体的生活描写来揭示当下社会怪相。对阎真的阐发则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心灵的挣扎与沉浮,表现知识分子在坚持操守和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这些作家虽然都围绕着官场这一个主题,却各自都有不同的切入点,龙长吟抓住了他们彼此之间的区别并做出了客观而中肯的评析。当下官场小说几乎都是现实主义作品,不少创作者对官场中那些“弯弯绕绕”的手段是怀着亲身体会的,因而习惯从现实的角度再现官场生态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第

四章对肖仁福作品介绍时就提到他写官员的态度:以行为的适当和失当代替以往官场小说的忠奸之分。“稳定”原则下,我们很容易看到两个极端现象,一是如刘春来《水灾》中所写,一旦地方发生自然灾害或矿难等重大事件,政府往往会快速处理,交出所谓“让民众满意”的答卷。第二种就是一般官场小说所揭露的,在日常工作中利用关系、权力来处理事务,肖仁福《家国》中柳居山处理杨劲松犯罪罪材料的事例就是“适当和失当”的代表。显然,龙长吟认同了作家的处理方式,这也成为论者本人对待官场怪状的立场。在龙长吟看来,当代官场乱象丛生的原因是中国社会处在转型时代,人们生活水平和思想观念的变化给官员带来了空前的诱惑,而制度的漏洞导致权力得不到制约,于是以权谋私屡禁不止。龙长吟广泛运用社会学关系学原理来解释官场的权力制衡模式。不过,这种文化立场虽然真实,但如果再从作品的审美性和批判性方面多下些功夫,则可能显得更加客观和更具说服力。

乡村:在疼痛中发展

——评肖勤长篇小说《水土》 □张羽华

张的尴尬处境,对贫困农民老孳和孙修民的艰难,向海都深表同情,他同情底层百姓,在事实面前又无能为力;他深切感受到开展基层工作的艰难,又痛恨一些基层官员的不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向海也总是与恐惧、悲伤和孤单为伴。由于父母过早离异,他从小与父亲在偏僻的水电站相依为命,与母亲一直保持距离,至死也没有打一声招呼。另外,向海与妻子小雨相互体贴,感情很深,但是命运又无意之中给他们开了个玩笑,小雨最终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此外,小说还通过向海的工作和生活,折射基层官员的生存本相。徘徊镇的基层工作折射了整个中国乡镇的干群形象,作者以切身的基层工作经验反映一些基层存在的复杂问题,既写出了基层官员工作务实与心灵的裂痛,又写出了基层官员在某些方面的惰性与勾结行当,同时写出了偏僻乡镇农民艰难的生存环境和他们的固执与刁难。作者没有夸大即存的事实,而是把基层干群关系纳入到一个具体的镜像中,折射出这些人的真实心态和基本看法。

在小说中,作者没有让任何一个声音去对某一件事件作出评判,而是把乡镇干群的具体境况展示出来,让读者去思考与分析,作出独立的判断。造纸厂给村民带来的灾难是难以估量的,但是面对村民的控诉和抵抗,基层领导始终保持着沉默。村民也一边痛恨这个厂,一边依靠这个厂赚取工资和收入。然而一向不喜欢向海的何达身患癌症后,却替向海承担了组织问责,而钱安图和造纸厂厂长为了阻止关闭工厂而造谣,但正直无私的县委书记东新红对负面的舆论不理不睬,最终关闭了造纸厂,还了寒凛一个公道。小说到最后,徘徊镇的党委书记被撤职,叶舞、向海等人调往城市,而乡村的干群日常生活依然持续着。《水土》是一部融乡镇农民生存状态、生存心理与干部工作心态于一体的新型乡土小说。小说削弱了官场之间的争斗与厮杀,增强了官场的温度,揭示出官员个体内心隐秘的疼痛与温情,写出了农民内心的孤独与苦难,生活的艰难与无奈。作为当代乡村真正的行走者、参与者、亲历者,任何个体的生命都在以合理的方式承担一定的责任,同时又必须忍受转型期社会带来的疼痛。如何在其中看到痛的根源并将这根拔掉,让痛更少一些,也许就是这部小说的意义之所在。

肖勤的小说扎根基层生活中乡村的变化,关注乡村弱势群体的生存命运,审视基层干部们的日常生活,描摹与群众不同的乡村社会图景,从时代转型过程中窥视人们生世相和精神状态,揣摩不同人面对生活的无奈与痛苦的心理。长篇小说《水土》以切身的乡村基层体验和艺术想象,向我们展示了现代乡土叙事独特的审美和美学风格。必须引起注意的是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向海本来是县医院主任医生,业务能力强,有机会到省城找个体面的工作,或者在本单位升迁,但是他不懂得官场潜规则,被下放到基层锻炼,分管基层最棘手的工作。向海的仕途困境折射出当代基层干部的生存状态和矛盾心理,当他来到徘徊镇时,首先面临的农村落后的瘴气风俗改革而导致的挖坟事件。50多岁的孙修民不能接受刚埋下的父亲被挖出来送到殡仪馆火化

大时代中的个人脉动

□赵振杰